



学步集

来向荣 著

时代作家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祖荫 张爱君

美术设计：箫 笛

ISBN 978-988-18709-9-5



9 789881 870995 >

ISBN 978-988-18709-9-5

定价：46.00元

学
步
集

来向荣 著

时代作家出版社

学步集

作 者：来向荣

出版单位：时代作家出版社

地 址：香港湾仔骆克道骆基中心23楼C座

编辑设计：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地 址：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书店

电 话：010-68920114 13693651386

网 址：www.grcsw.com

印 刷：京冀印刷厂

开 本：170×240 1/16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988-18709-9-5

定 价：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我的大学.....	1
儒法集.....	80
梦幻集.....	115
天海吟稿.....	210
落叶归根.....	257
第一辑 诗词.....	257
第二辑 楹联.....	282
近体诗中的孤平和拗救.....	294
一、引言.....	294
二、唐律诗中的孤平（含五代十国）.....	299
三、宋律诗中的孤平.....	316
四、唐绝句中的孤平（含五代十国）.....	322
五、宋绝句中的孤平.....	327
六、袁枚《随园诗话》中的孤平.....	363
七、拗救.....	366
山山黄叶飞.....	379
山山黄叶飞.....	379
冷月葬诗魂，有兴悲何极.....	382
妙玉可比霜娥，不可比嫦娥.....	384
魏延之死.....	387
光绪帝与白居易的两首七律.....	390
杨万里的绝句.....	391
借鉴与化用.....	393
后记.....	397
参考书.....	398

我的大学

1

1955年，我中学毕业，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攻读数学。新的世界在我的面前展开，我向人类的知识宝藏索取。我努力，我奋斗，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到自己多么幸福。

2

我们年级共有8个小班，数学4个班，力学4个班，每班约30人。我所在的数学1班是个满不错的集体，勤奋刻苦，对专业怀有浓厚的兴趣。同学中，家在北京的不多，大部分人来自全国各地，远离家乡和亲人。初涉人世，我们十分珍视友谊。在未名湖畔散步，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我们对自然、人生和科学，有过许多严肃认真而又天真稚气的讨论。怀着对真善美的渴望，我们那样神往于使人向上的东西。在湖畔花神庙前的平台上，我们摄影留念。春游樱桃沟，我们拍了好些照片。团员轮流记团小组日记。在日记中，我们敞开心扉，深入交流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和感受。班上让我主持墙报，我认真撰写发刊词，同学们踊跃写稿，表现了多方面的兴趣。因为功课繁忙，墙报没有坚持办下去，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生活困难，买不起衣服，团支书送我蓝制服，其他同学送我衬衫等。女同学看见我的包破烂，特地给我做了一个崭新的布书包。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是我从少年儿童队到青年团以来的深信不疑的信念。

3

我爱好思辨，喜欢辩论。在北京大学1957年5月19日以后的气氛中，我对理论的兴趣空前高涨。但我没有参加过当时的各种社团，没有张贴过大字报、小字报。我认为自己的知识不够，当前的任务是学习。

4

在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了。我不能适应这种突然的转变，认为这不是正常的辩论，深信当时广泛流行的传闻：“毛主席赞成放不赞成收”。时值期末，《中国革命史》课程印发了一份开卷考题目录，供选择。从1957年6月30日至7月6日，我以“革命史试卷初稿”为副标题，奋笔疾书，写成数万字的《民主问题论纲》，纵论民主问题的各个方面，涉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南斯拉夫问题、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并评述了当前的反右派斗争。文章目录如下：

一、总论

- 1、关于民主的阶级性
- 2、关于民主与集中
- 3、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

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

- 1、概论
- 2、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析

①斯大林主义时期，兼论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问题及对《一论》、《再论》的批评意见

②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阶段——政治民主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中的《一论》、《再论》，指《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时，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修改和补充，已经公开发表。我注意到，同江隆基副校长原来的传达相比较，有了好些差别。我也注意到，毛主席提出了判别人们言论行动的六条政治标准。此前，毛主席在1957年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我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我认为，自己的文章完全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立论，是绝对不违背六条政治标准的。我在文章中，对毛主席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给予高度评价，摘引了毛主席大段大段的话，来说明当前反右派斗争的失当。我摘引的话有：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的发展。

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

“思想斗争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的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等等，等等。

我的文章中包含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提法和论述。比如，我论述了“革命警惕性之转化为自身的反面：人们之间神经过敏的猜疑和不信任”。我不同意把领导人的话视为法律，不同意站稳立场就是无条件地跟着舆论走，不同意把改革意见统统斥之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而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同意对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进行围攻：翻出其历史，揭露其言行，用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断章取义的论证方法，把提意见的人推论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甚至更进一步。我批评“敌人高兴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欢迎”这个公式，认为这个公式包含着形而上学，不符合辩证法。我批评《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中国上空黑云乱翻，是源出于章罗同盟的论断，认为这是极大的主观主义，认为这种从个别人的活动去寻找历史事件的原因的观点，是唯心史观。我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在大学生中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压服，等等。我的文章的结尾处的话是：“为了分辨毒草与香花，需要考验的时间，这是一个铁的规律。呵，英明的毛泽东万岁！”

5

1957年7月16日，我把写好的文章给C看，征求意见。C是团支书，是班上唯一的共产党员。她来自重庆，我来自自贡，全班只有我们两个四川人，自然感到亲切。我的学号是5501202，她的学号是5501203，55表示1955年入学，01表示数

学力学系，202和203是编号。编号按地区排序，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排在最后。在同一地区，我排在她之前，可能我的高考总分比她高一些。我于1952年5月，由中学的少年儿童队大队组织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以后，当过团小组长、团支部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书记。由于这种经历，我对C充分理解。我们常常讨论问题，交换看法。她的父亲是私营工商业者，在1956年曾写过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准备发表，她把稿子拿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认真阅读后，写成详细材料交给她。她很赏识，认为我“有一定理论水平”。我十分自然地把这次就民主问题交换看法，视为以往同她多次交换看法的继续。我对她完全信任，并深信自己的文章中没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我很坦然，但不愿张扬，不愿惊动别人，叮嘱她不要把这篇文章拿给别人看。她当时的想法同我一样，满口答应。

6

我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星期后，C把原稿还给了我。但我的文章已被油印成小册子，同班人手一册，开了持续一个星期的批判会，对我的文章逐段逐句进行批判。听说，在此之前，已在全系的党员中进行过批判，他们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材料。我的文章被说得一无是处，被视为集各种谬论之大成。我忿忿不平，认为：对小人物的毫无道理的轻蔑，是对大人物的无条件崇拜的反面表现。我很自负，虽不至于认为自己的每个论点都是正确的，但一般和整个说来，我认为自己的文章有创见。在这之前，我没有写过大块文章，这篇文章是我的处女作，我珍视它。论点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不恰当的观点和提法可以纠正，但说我有不良的动机，是天大的冤枉。对于严厉的批判，我并不介意，我的许多论点在批判时被歪曲了，他们并没有真正驳倒我，触动我。经过锤炼，我更加自信，更加坚强。但C在最后一次会上的长篇发言，是对我的沉重打击。不是她的论据说服了我，而是她的坚决的态度震撼了我。会后，她把这篇副标题为“答《论纲》作者”的发言稿，亲手交给我，表示我们之间这段交往的结束。事隔多年，我对她的批判的具体内容全忘记了，但其中追述友谊，解释她曾极力为我辩护的话，特别是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有同样善良的心灵，我们都有考察事物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至今没有忘记。她的这篇文章，我一直保存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许多东西被抄走，她的这篇文章也被抄走。1979年，北大党委组织部的杨同志到数学系做落实政策工作，她在退还我的部分被抄

材料时，对我说：“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就不退还你了。”这是后话。

7

悲哀的经验，能锻炼人的感情，使它更为崇高，更为纯洁。这种境界，我体验到了。同人类身体的素质相比较，人类道德方面的素质更富生命力。悲哀很少使人丧命。一个人不可能长久地沉溺在悲痛里，青春的力量和生命的力量更强。生活的潮水不会静止不动，它将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卷进漩涡，不顾一切地推动我们向前。我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日子里这样心安理得，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日子里这样清楚地体验到自己的性格。往事在我的心上一幕一幕地展现出来，在看待它们的时候，我能够更客观些和更冷静些了。人类诚然是节外生枝，枝外又生节的。痛定之后，漫作长歌，可以舒筋活血，畅怀荡气。

8

最大的折磨莫过于良心的负疚和责难。对于心地光明的人，不管在生活中遭遇到什么，他虽然在短时间内也有困惑和不安，但经过这种悲哀经验的体验，他的心会逐渐趋于平静。人们的指责不管多么庄严郑重，但如果是莫须有的话，他又能有何感应呢？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一个清白无辜的青年，他的意志之坚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拟的。他既不懂得势利，也不懂得委曲求全。他只承认真理和逻辑，不会屈服于施加给逻辑的暴力。向怀有成见的人说明其成见的不公允，对于一个男子说来，是不屑为的并且是无益的。真正的清白，是不需要急于表白和急于表现的。了解我的人不会责备我，不想了解我或不能了解我的人的责备，不会使我痛苦。能够以谦逊的态度来观察人生、对待人生的人，不会惶惶不可终日。对于爱我的人，我感到惋惜。对于恨我的人，我面带微笑。不管头上是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9

从根本上说，在天地之间，各物有各物的主人。不是自己所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该要。但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是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无穷无尽的宝藏。我拥有这宝藏，已经心满意足了。我并不妄自菲薄。我在自己的心灵中发现无穷无尽的力

量，我感到与天地万物溶合而为一。诚然。世界上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力量的。

10

漫步在校园的路上，感到灵魂的飞扬，对心中的力异常得意，同每株草木、每只飞禽、每朵白云、每阵清风打成一片，禁不住跳跃起来，舞蹈起来，或吟或唱，悠然陶然。一个人还能向生命要求些什么呢？幸运之神降福于我，我过分地受福了。人势，财富，或者命运，都不能消灭爱自由的人。不公正的人们的冷言冷语，或者专横，或者污蔑，都不能毁坏我的心灵。我感到胸中有一股浩然之气与天地宇宙相连接。我以为，刀搁在脖子上的滋味，也不过就是这样了。

11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行政处分是“保留学籍，留校考察”。当时，对划为右派的学生的处分有以下五等。特等：开除学籍，留校作反面教员，全校有两人。一等：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二等：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理科的到北京市有关工厂，文科的到北大下放干部基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乡和清水乡。三等：保留学籍，留校考察。四等：免于处分。我强烈希望换一个环境，打报告申请就业。我的就业申请没有获批准，只批准我到北大下放干部基地劳动。被批准的人中，有划为右派的学生，有划为右派的教职员。在教职员中，有受降职降级降薪处分的，有免于处分的。我于1958年4月16日离校，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乡的上达摩村。达摩是北大数力系和中文系的干部下放点，数力系在达摩庄和西达摩，中文系在上达摩和洪水峪。与我一同分在上达摩的，还有同系的金，他比我低一年级，在此之前不认识。我们直接接受中文系四位年轻老师的领导和监督。下放干部在劳动锻炼中，也有改造思想的任务。监督改造右派，被视为对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重大考验。对于4月16日这一天的旅行，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从清华园到雁翅，是乘丰沙线的火车。从雁翅到达摩口，是乘装载行李的卡车。雁翅到斋堂的一段，有小三峡风光，令我惊喜，缺点是简易的泥土公路尘沙飞扬，一路滚滚黄埃。斋堂到达摩口的一段，当时还没有公路，卡车沿鹅卵石累累的河滩地颠簸行进，振荡得厉害，不时把人弹起来，头晕目眩。从达摩口到上达摩，是十五里的登山小路。出发在清晨，到达早就天黑了。

12

上达摩村座落在群山的峪谷，安静，幽深，有太古之风。一旦觉悟到内在的力量，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到无比的愉悦。我可以随处创造乐园，让灵魂徜徉于其中。一种静谧的欢欣充溢于我的每根神经，每条血管。劳作于荒山漫草之间，漫山遍野盛开着杏花与山桃花，在层层的峪谷之中，迤逦而稀疏地点缀着几座小屋，空气中抖过淙淙的泉水声。在此情此景中，古代诗人的佳句涌出心头，我有如醉如痴之感。午间歇工，仰卧于山坡之上，咀嚼着饭盒中稠稠的小米粥，并烧起熊熊野火来。少顷水沸，舀而啖之。食毕席地而卧，酣然小睡。傍晚时分，荷锄归家，一行十数人众，冉冉漫步，歌声时起。我滥竽充数于其间，沉吟古曲，赏心流盼，欢悦之情不能自己。

13

山中风光，饶有特色。山中生活，别有情趣。山中居民，淳朴刚强。它同我的性格发展的现阶段的状况，正相适应。我对北国的刚毅和坚强，深深地爱上了。一般说来，南方的灵魂是温柔的，但也是脆弱的，它需要锤炼、冶铸，吸取宝贵的生命力。唯有这力才是人世间的珍宝，唯有这力才能使生命健全。在它的面前，物质生活的艰苦和内心的暴风雨，都会苍白失色的。有时，我情不自禁地沉吟《苏武牧羊》的古曲，体味到一种伟大、庄严、崇高的感情。我没有凄怆之感。我把这支古曲同现代歌曲《青年垦荒队员之歌》一起唱，或者同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一起唱，在情绪上没有不协调的感觉。

14

下放干部有自己的菜园子，轮流做饭。当时，还没有右派分子不能进厨房这个说法。实际上，限于条件，我们没有专用的厨房。做饭的地方，是紧靠住房临时架起的棚，一方敞开，可以自由出入。原来很简易，我与金到来后，作了些修缮，顶上铺了薄石板。这些石板，是老乡带领我与金，沿着比羊肠小径还粗糙的山路，攀登到悬崖绝壁之上，由老乡替我们采下，让我们背回来的。为了防冻，水缸放在住房内。轮到值日，别人视为休整，可以做好些个人的事情。我因不会做饭，值日比下地还忙乱。好在房东赵大嫂非常淳厚热心，我事事向她请教。依葫芦画瓢，居然也对付过去。有一次，下放干部还称许我炒的某个菜好吃。后来发现是油放得多，他们严肃地向我指出来。公社化后，村里办食堂，我们免了这

件事。以后，在东斋堂村，村办食堂解散，下放干部中有专人给北大的人做饭，我没有可能再参预这件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时，监改人员提出不许右派分子进伙房这个说法，此说一出，我更只能远离庖厨了。这是后话。

15

我们参加了清水至斋堂的公路的修筑工作，负责达摩口附近的一段。我的任务，是用背篓背运河滩地上的沙子和石子，这种混合物很沉重。天朦朦亮起床，匆匆吃完早饭，走十五里山路赶到达摩口。午饭有人送。傍晚收工，回上达摩吃晚饭。一天下来，感到很累。好在我自幼有担水的习惯，挑抬有一定基础，经过几天的磨炼，便顺利地过了劳动关。我精神振作，生气勃勃，体验到战胜困难的欢快。斗争的生活使人干练，苦难的煎熬使人醇化，从今而后，我觉得自己无往而不勇敢了。1958年6月底，天气闷热，一连几天早战夜战，三顿饭都从上达摩送来。深夜一点左右，在清水觅得一粮店，在门口露宿三个小时。骤雨，月光，烈日。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境界。经过这次筑路锻炼，我对以后的劳动不再感到有什么困难。上达摩山高坡陡，背篓是基本的运输工具。用大花篓满载小米穗从南港翻山越谷至晒场，路径奇险，我感到自豪，得意。背煤也是重活，但没有诗情画意，没有背大花篓翻山越岭那种风光和写意。把收割完玉米的玉米杆扎结在木制架子上，如同一堵厚实的墙壁，这种东西更难背，需要借助一种T形拄杖背起并歇息。这种墙壁，如果不太重，我能背上站立起来。只要能站立起来，也就能背回来。太重的，我背上站立不起来，多次尝试均告失败。金来自福建莆田农村，家庭成份贫农，是干活的把手，比我强壮，我背不动的，由他背，我甘拜下风。冬天到深山密林砍煤窑用的窑柱，我不能砍下并背回大号的，但一百斤多一些的不成问题。路险雪滑，这项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是我在上达摩干过的最重的活。另外一件重活，是国庆期间为赶修秋收晒场担水。场在高坡之上，水在深谷之中，一担接一担往上挑，水泼在场上。驴拉石滚碾压平整。担水的情景，同徐悲鸿画的巴人担水很相像，并且路更陡峭，巴人走的毕竟是石板砌成的梯路，我走的说不上是路。桶是铁制的，空桶已有一定份量，盛水后显然不轻。一连几天下来，感到很累。但我挺过来了。赶驴的老农对我很称许，说我干活踏实，不偷奸耍滑。其他的一些活，像刨地、拾地、背粪、撒粪等，都是轻活，不在话下。拾杏时节，踏遍青山，感到风景这边独好，如同游历一样。

16

上达摩有一处叫苗儿岭的地方，群山重叠，险峻幽邃。身历其境，可以使人联想起小时读过的某些武侠小说。听老乡讲，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带是游击区，游击战士曾在此处躲藏过。在这样的地方锄地，带上一本《古文观止》，休息时放声朗诵苏东坡的《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等文，快感无限。在高山之巅，笑看孤傲的浮云，笑着俯视尘世，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老乡说，这个地方，一年只来两次，一次播种，一次收获。播种之后，我一直念念不忘收获，期待着再来。收获时节，我果然获准再来，喜不自胜。掰下玉米后，我的任务是把部分玉米杆扎结到木架上背回。这种经历，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中，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在心中默念：我要登上高山去，笑着向你俯视！

17

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特别强烈的，还有一些不寻常的日子。1958年7月下旬的某日，上午拾杏，午饭后到一个深潭游泳。这是今年第一次游泳，让清澈的山泉洗涤身心，十分惬意。傍晚收工时，大自然忽现奇观。层层黑云，将斜阳映衬为一种极奇特的黄色。远处雷声隐隐。沿山路而下，人仿佛被罩在一重带雾的黄光里。四顾静寂，万籁无声待雨来。我以为这是大自然在给我加冕。不知怎的，在我的心镜上，突然映现出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1958年的7月，世界是很不平静的。我想，山雨欲来，当前的世界局势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刚刚到家，就是滂沱大雨。我的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感觉。我感悟到，人不应当降低自己，人应当凌驾于烦琐之上，超越卑俗，去读云彩写在太空面庞上的文字，去欣赏暴风雨的壮丽画图。我崇拜暴风雨中的海燕，崇拜那些熟练的弄潮儿。他们在怒涛的威压下，安详等待。当浪头把他们逐渐高举时，悉心准备。紧握时机，他们掷出那有力的一击。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位置。

18

每隔一段时间，我必须写思想汇报或思想小结。我怀着极大的真诚，联系自己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字斟句酌，每次都洋洋洒洒地写成自以为满漂亮的大块文章，递交上去。但他们并不赏识。当时没有想到保存底稿，后来感到可惜。我

渐渐醒悟到，他们所理解的改造，不是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对性格的驯服。他们对我的看法和评价是：“没有沉痛的感觉”，“不像改造的样子”。我认为他们的看法和评价很恰当。我没有犯罪，没有负罪感，找不到沉痛的感觉。我在小组会上直率地表示：要他们认为我表现好，我没有信心。下放干部X是宁波人，干活努力，但有一些我当时不能理解的见解。他坚持不吃杏，又说他是吃梨的，并说黄瓜生吃是多么好。现在来看，他关于黄瓜生吃的见解是有科学根据的，他不吃杏也可以有合理的解释，比如可解释为对杏有过敏反应，或解释为他憎恶这种东西。我当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黄瓜生吃，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认为他的见解很独特，不近情理。特别是，他在我面前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很矜持，认为他重任在肩，太忙，太忙，似乎已经到了应该由少先队员来献花致敬的程度。他对我很藐视，很轻蔑，认为我是一个吃闲饭的人，经常说：“你有什么事呢？你有什么事呢？”在他的眼里，我每日的劳动和担负的扫盲工作似乎都算不得事。他对自己拥有的监督改造右派的权利特别执着，认为事事都要让他看得顺眼，仿佛这个世界是特地为他而造下的，他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各种特殊见解，来现实地具体地对我进行改造。一天晚饭后，我看了五分钟的《水浒》，我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引来了无穷无尽的责难。这些小刺激使我很不痛快。我对毛主席当时引用的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对毛主席当时的话——“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对毛主席当时的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是心悦诚服的，认为飞动之致，令人神往。但对当时下放干部领导传达的一句很时髦的话——“做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我总有格格不入之感，不肯苟同。人类生来就是为了高翔，不能奋飞是最大的忧伤。窒息了生气，窒息了创造性和主动精神，飞动之致，邈不可期，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由于有这种深层次的隔膜，难怪他们会认为我表现不好。在一次小组会上，我竟然不识时务地和毫无自知之明地批评起他们的精神风貌来，认为他们风格不高，精神不够振奋，斗志不够昂扬，使他们大为生气。正在此时，村里要选派青壮组成筑路队，外出修筑清水至杜家庄的公路。我当然是被选中的一个。外出这段时间，尽管生活紧张，劳动艰苦，但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耳不听，心不烦，我感到非常快活。以后，我还参加过上清水的深翻地会战，到洪水峪修渠，等等。干这些活都要加班加点，早战夜战。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即使在村里，也常有“苦战若干天完成某项任务”这类事。上达摩民风

淳朴，响应号召，领受任务，从不含糊，从不讨价还价。公社化期间，下放干部分析群众的思想情况时认为，在我们居住的下组，仅有一户老太婆思想不通。当时，不知从何处传来谣言，认为每家每户的生活用品，包括衣被等，都要均分。只是在这时，村民才感到了真正的恐慌。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把多年舍不得用的被褥铺盖起来，把多年舍不得穿的衣服穿起来，大姑娘小媳妇穿上红红绿绿的新衣服下地。谣言很快澄清：公社所有是指生产资料，不涉及社员的生活资料。于是，他们又把新衣被收拾起来，恢复了原貌。

19

我白天劳动，晚上还有扫盲任务。我的第一个扫盲对象叫张俊儒，他对我很好。在煤油灯下教课完毕，我们常常躺在炕上聊天。他认为我根本不是坏人。上达摩居民的住房分散在一条峡谷之中，由下而上有一里多地，我住在下面，张俊儒住在上面。我没有手电筒，在月黑夜或雨雪天气，来回走这段路不容易，需要一定的胆量。中途经过一个废煤窑的洞口。白天路过时往里看，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晚上经过时，我总有点莫名的紧张，快步走过去，从不往洞的方向看，总以为里面有什么东西会突然窜出来。这种心理状态，自己也感到很可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去除。有时下瓢泼大雨，张以为我不会来了，而我按时到，他很受感动，劝慰我下雨时不必来。有一次，大雾浓重，细雨濛濛，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教完课，拄着一根木棍，在泥泞里一步一步地摸下来。在这种境况中，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经过洞口时，我不再害怕，索性停下来往那个方向看，要验证一下究竟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我没有看见任何东西，那个方向同别的方向没有什么不同，一团漆黑。什么奇迹也没有发生。到家以后，我很兴奋。可怕的东西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自己的想象。张俊儒原先已认识好些字，不算全文盲。教完他后，我教一个组，仍在上台。我有时还到张俊儒家去，他对我始终很关切。在上达摩的最后一段时间，我的扫盲对象是一位大嫂，家在下台，离我们的住处不远。当时发生了以下一件事：比我和金晚来的中文系研究生张某是青光眼，虽然手持电筒，还是在一天夜里扫盲时，把眼镜跌碎了。下放干部注意到了这件事，把我们的扫盲对象都调整到下台。在上达摩，除了张俊儒，还有好些人对我不错。下组有一位哑巴，总是乐呵呵的，他有一个儿子，人称小哑巴，队里多次派我同他们一起干活，他们对我都很和气。